



钮 仲 勋 著

地 理 学 史 研 究

地 质 出 版 社

57.104
637

地理学史研究

钮仲勋 著

地质出版社

· 北 京 ·

0039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理学史研究/钮仲勋著.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6. 8

ISBN 7-116-01858-1

I. 地… II. 钮… III. 地理学史-研究 N. K9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2842 号

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83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责任编辑: 杜广慈

*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¹/₃₂ 印张: 4.375 字数: 94 千字

1996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1996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 册 定价: 5.00 元

ISBN 7-116-01858-1

K·94

39200

前 言

地理学史与历史地理系相邻学科，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交叉与渗透的关系，我国前辈学者在研究历史地理的同时，往往也从事地理学史的研究，个人研究地理学史的契机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我研究地理学史的内容，主要可概括为三个领域，即古代天文大地测量、古代地图、古代地理考察和认识。

在地理学史的研究中，古代天文大地测量是我最早从事研究的领域，50年代末期即有所涉猎，从70年代中期开始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不仅研究其成就原因，而且对唐代张遂（一行）、元代郭守敬、明代徐光启、清代康熙、乾隆诸次测量都进行过探讨，他如明清之际西方测量技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我国各民族对康熙乾隆年间测量的贡献等问题均作过专题研究。

测量与制图，两者之间有相当的关联，因之，个人在研究测量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古地图进行相应的研究。我研究古代地图，着重于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分期及几种主要地图的系统渊源，对一些著名的古地图，如《郑和航海图》也进行过探讨。

我对古代地理考察和认识的研究，较前两者为晚，80年代初期，参与编著《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一书时，负责撰写该书第十章“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研究”，才开始触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尔后，陆续对中亚、南海、黄河源的地理考察

和认识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古代航海活动与地理考察和认识密切相关，因之，个人在从事地理考察和认识的研究时，也对古代航海进行过一些探讨。

限于条件，这本文集只能选收我在地理学史方面所发表的部分论文，通过这些论文大致可以反映出我在这一学科方面的研究进展。其中有的论文在个别地方作过修改，有的论文의注釋位置亦有变化，谨此说明。



作者简介

钮仲勋, 别名钮先铎, 江西省九江市人。1928年12月出生。195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196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及地理学史研究, 在历史边疆地理、区域开发、环境变迁、古代地理考察和认识、古代地图、古代天文大地测量等研究领域多有建树。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地理学史的个人专集,内容主要包括古代地理考察和认识、古代地图、古代天文大地测量等三个方面,均为地理学史和科技史所关注的问题。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考证严谨,论述精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可供地理、测绘、旅游、历史、考古、图博等专业的科研人员与大专院校师生参考,亦可供中等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阅读。

目 录

黄河河源考察和认识的历史研究	(1)
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	(12)
郑和远航以前中国人在南海之航行与地理认 识	(28)
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发展及其成就	(40)
我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及其成就	(56)
论“计里画方”地图在我国的发展 ——从裴秀到罗洪先	(72)
试论明清两代地图的系统渊源	(80)
《郑和航海图》的初步研究	(91)
我国古代天文大地测量发展及取得成就的原 因初探	(102)
明清之际西方测绘技术对中国的影响	(113)
我国各民族对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经纬度测量 的贡献	(127)

黄河河源考察和认识的历史研究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文化的发源地。黄河的源头在哪里？这一问题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曾进行过多次探讨和考察，留下了许多记述。这些记述不仅仅反映了当时对河源的地理认识；而且也为研究河源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黄河河源考察和认识的历史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历史地理或地理学史来说，都是重要的课题。下面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相信这一探讨有助于对河源问题的研究。

我国历史上对黄河河源地理的考察和认识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先秦迄至现代。从其发展过程来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至唐初，第二阶段为唐初至元初，第三阶段为元初至现代。本文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三个阶段来论述的。

—

战国时代的地理名著《尚书·禹贡》提出“导河积石”，是我国历史上有关黄河源的最早记载。《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河州抱罕县条：“积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积石山，在县西北七十里。按河出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故今人目彼山为大积石，此山为小积石。”同卷鄯州龙支县条：“积石山，在县西九十八里。南与河州抱罕县分界。”故积石有二，以今地言之，大积石即今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小积石在今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附近。《禹贡》的积石，一般认为是小积石，离河源尚有相当的距离，但在当时地理认识已达到如此程度，还是极其可贵的。较《禹贡》稍晚的《山海经》也记述了河源。《山海经·北山经》：“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海，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山海经·西山经》：“不周之山，……东望渤海，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山海经·西山经》：“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敦薨之山即天山，敦薨之水即开都河，渤海即罗布泊。《山海经》的作者对河源的认识远不及《禹贡》的作者，他认为河出昆仑，流入渤海，然后在积石山（亦指小积石）下又冒出河水，这种模糊不清的认识，实开尔后“黄河重源说”的端倪。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朝派张骞通西域；张骞此行具有地理考察意义，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有关西域的地理认识，但对黄河河源的认识却是错误的。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根据张骞的见闻来写的，可以反映当时对河源的认识。它记载：“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它还记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通过张骞的报道以及其后汉使的实地考察，基本上形成了“黄河重源说”：即河出昆仑，经于阗流至盐泽（即罗布泊），然后潜流南出。东汉班固撰写《汉书》，他本人虽未到过西域，但他的弟弟班超却长期在西域活动，对那里的情况多有了解，因此，他在《汉书·西域传》中除承受张骞等对河源的认识外，还稍有发展。他记载：“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

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与《史记·大宛列传》所不同者有两点：一是认为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今帕米尔），一出于阗（今和田）；二是明确指出河从盐泽潜流，南出积石。这样，“黄河重源说”便确立了。这种说法将昆仑山以东的黄河水系和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河水系连在一起，显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认识，但这一错误的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清末，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仍说：“河有重源，均出昆仑，稽古证今，一一吻合。”

《后汉书·段颎传》载颎自张掖追西羌，“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这条记载一方面反映直到东汉后期还是以积石山（小积石）为河源，而另一方面反映对“河源”已初步有里距的概念。

清汪懋麟《经济论考源》卷七《黄河考》引《博物志》：“河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带赤色，后以诸（羌之）水注之而浊”（《河源纪略》卷32《杂录》亦引此条，仅多“羌之”二字）。按《博物志》系西晋张华所撰，该书久佚，后来的辑本都未收录此条，且现存《博物志》辑本卷一《水》中有：“四渎，河出昆仑墟^[1]。”在同一著作中竟对河源出现两种不同的认识，因此，这条资料尚待查考，不便作为“河出星宿”的最早依据。与张华同时的杜预，在《春秋释例·土地名》中说：“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西晋西平郡治在西都（今西安市附近），据近人推算：西晋一里为436米，二千里为872000米^[2]，即872公里。以上述的方位里距来计算，“西平西南二千里”已在河源西南很远之处。因此，这条资料也不能说明对河源的正确认识，只能反映其认识已逐渐接近河源地区。

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平吐谷浑，置河源郡，治所在赤水城（在今兴海县东南），辖境相当今共和、兴海、同德、玛沁等县地。虽未包括真正的河源地区，但在地理认识上也是有意义的，因它以河源命名政区，反映河源就在这附近一带。

二

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唐将侯君集与李道宗率军追击吐谷浑部众的过程中，曾到达河源地区。《旧唐书·吐谷浑传》：“（李）靖等进至赤海，遇其天柱王部落，击大破之，遂历于河源。……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汉哭山，饮马乌海。……又达于柏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旧唐书·侯君集传》所载略同，但多“转战过星宿川，至于赤海”。星宿川即今星宿海，柏梁或赤海即今扎陵湖。这是历史文献上开始明确记载有人到达河源地区并进行观览。稍后，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文成公主入藏，“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3]。”关于文成公主入藏之经行路线虽不能确指，但经过河源地区则是事实。贞元十四年（公元 798 年）贾耽绘制《陇右山南图》，《旧唐书·贾耽传》载其献图表云：“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剪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从上述献图表所涉及的体例及内容来推测，贾耽所绘制的《陇右山南图》及其所附的《别录》中，应该有涉及河源地区的内容，但可惜的是图及《别录》均已丢失。贞元十七年（公元 801 年），贾耽又绘制

《海内华夷图》，该图虽已不存在，但在今西安碑林中仍保存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上石的《华夷图》，此图系根据贾耽的《海内华夷图》辗转缩绘而成^[4]，故通过它多少能反映贾耽绘制《海内华夷图》时的地理认识。《华夷图》虽将河源画得很简略，但它毕竟是绘有河源，而且它还将河源绘在廓州（治所在今化隆回族自治县西黄河北岸）西较远的地方，从方位上来看同真正的河源也是较为接近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刘元鼎奉使入蕃，道经河源地区。《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途中见闻：“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据近人考证，紫山为巴颜喀拉山^[5]。刘元鼎记载河源出自紫山。并述其水文情况，这在河源认识历史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总之，唐代由于在河源地区的活动较多，故在认识上较前有所进步。

三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朝政府派都实从河州（治所在今临夏东北）出发探求河源，“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6]。”这是历史上有目的对河源进行考察之始，同前人经历或到达这一地区是有所区别的。后来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所云，撰成《河源志》，该书可视为这次地理考察的成果。《河源志》云：“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迹，逼视弗克，旁履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

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广轮马行一日程，迤迤东骛成川号赤宾河^[7]。”上述记载明确指出黄河发源于火敦脑儿（即星宿海），其下为阿剌脑儿（即扎陵湖和鄂陵湖），而且对星宿海一带的地理情况作了较为生动的描述。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录有《河源志》，且附有一张《黄河源图》。上面提到都实在考察回来之后绘有地图，陶宗仪将《黄河源图》与《河源志》放在一起，反映此图与都实所绘之图有一定关联。这是目前尚存有关河源地区最早的一幅地图，此图绘有星宿海与阿剌脑儿，与《河源志》所载相符。这一书一图，可以说使人们对“河出星宿”有了较深的认识。都实通过实地考察以后还对“黄河重源说”进行了否定。《河源志》是这样记述：“史称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于阗水北行，合葱岭河，注蒲类海，不流，洑至临洮水自南来，非蒲类明矣。询之土人，言于阗、葱岭水，其下流散之沙碛^[8]。”这件事对河源认识历史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元代，朱思本还从八里吉思家取得帝师所藏梵文图书，翻译成汉文。其书原作者当系藏人，所记内容与《河源志》互有出入。朱思本云：“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9]。”他的这段话很值得注意，因它反映当时已有人认识黄河源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这是地理认识达黄河上源地区之始。朱思本曾花十年时间绘成《舆地图》，并刻于石上。《舆地图》及刻石均已失传，但出自朱思本《舆地图》系统的《杨子器跋舆地图》在星宿海的下方绘有两条很短的尾巴^[10]，虽然还不能据此推断这两条尾巴相当于黄河上源的哪两条，但从地图方面多少可以反映当时地理认识已达黄河上源地区。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僧宗泐奉使西藏归来，经过河源地区，其《望河源》诗自注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11]。”抹必力赤巴山即今巴颜喀拉山，牦牛河即通天河。虽然早在唐代刘元鼎就已指出河源出自紫山（即巴颜喀拉山），但宗泐更进而指出河源出自巴颜喀拉山的东北；并且还指出抹必力赤巴山为黄河与牦牛河之分水岭，这在河源的认识上也是一个进步。“抹处”应为玛曲的不同汉译，说明至少从那时起，当地的人民已将黄河称为玛曲。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拉锡、舒兰等奉命前往考察河源。拉锡等一行于当年六月到达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又达星宿海西部考察。他们绘有《星宿河源图》，舒兰并撰有《河源记》。《星宿河源图》在渣凌诺尔（即扎陵湖）西绘有三支河，中间一支绘得最长，并在中间这条河上注记：“黄河源三河名固尔班索尔马。”反映通过这次考察他们已知黄河上源分为三支，皆东流入扎陵湖，他们把这三条都当作黄河源。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派遣喇嘛楚几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前往河源地区测量绘图。次年编绘的《皇舆全览图》吸取了这次成果，该图标明黄河上源的三支，中间一支名为阿尔坦必拉。《皇舆全览图》是绘有经纬度的实测地图，在当时来说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它对河源的绘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的地图如董方立的《皇清地理图》、邹世诒的《大清一统舆图》等多依据它。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齐召南利用《皇舆全览图》及其它资料编著《水道提纲》，这是一部有关河流水道的名著，其中也描述了河源水系。它记载：“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拉山之东

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又东流数十里，折东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谓火敦脑儿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阿尔坦河，虽无人寻源，但知起星宿，未知其西尚有本源。蒙古谓金为阿尔坦，言水色微黄而溜甚急，真河源也。]……阿尔坦河东北会诸泉水，北有巴尔哈布山西南流出之一水，南有哈喇答尔罕山北流出水，来会为一道（土人名三河曰古尔班索尔马），东南流注于查灵海^[12]。”上述记载明确说明黄河上源有三条河流，中间一条名叫阿尔坦河，是黄河的本源。从拉锡等考察河源直至齐召南撰《水道提纲》，凡五十余年，经过人们的考察、测绘和探讨，总算对黄河上源地区有一初步的认识。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阿弥达又奉命前往河源告祭河神，经过他的考察，又认为星宿海西南有一条阿勒坦郭勒。《湟中杂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阿弥达考察河源的情况：“查看鄂敦他拉共有三溪流出：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即沿溪行走四十余里，水遂伏流入地，随其痕迹，又行二十余里，复见黄流涌出，又行三十里，至噶达素齐老地方，乃通藏之大路；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蕃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13]。”康熙时实测和《水道提纲》所云阿尔坦河指玛曲（约古宗列渠），阿弥达所称阿勒坦郭勒指卡日曲，地名虽同，但所指是两条河。阿弥达考察完毕后，当年乾隆即令纪昀等人将自汉迄清有关河源的论述编纂成《河源纪略》一书，由于编纂该书的人迎合乾隆深信“黄河重源说”的意图，故将“西域之河源”与“吐蕃之河源”加以调和。从地理认识的角度来看，该书的价值不大，但从它汇编河源问题的资料来看，仍有一定的价值。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一些外国人到河源地区活动并进行测绘，但并无新的发现。

1952 年，黄河河源查勘队在河源查勘了 4 个多月，行程 5000 公里，搜集了丰富资料。这次查勘的结果，认为黄河的正源是约古宗列渠。而对扎陵与鄂陵两湖的位置也提出与历史传统不同的看法，加以颠倒。1978 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又组织有关单位在河源地区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在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地貌、水文、地名调查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果。这次考察的结果，认为黄河的正源应是卡日曲。对两湖的位置又恢复历史传统的说法。

四

通过对河源考察和认识的历史进行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的几点看法：

第一，总观我国对黄河河源地理考察和认识的发展大势是：第一阶段，其认识尚未达河源地区；第二阶段，历史文献开始记载有人到达河源地区，其认识已达星宿海；第三阶段，已有目的地对河源进行考察，其认识达于星宿海以西的黄河上源地区。由于河源地处高寒，交通困难，从战国《禹贡》的“导河积石”，到 1978 年的河源考察，历经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河源的认识才愈来愈明确，但中间也出现曲折和反复。如“黄河重源说”这一错误认识自西汉至清代长期在河源认识问题上进行干扰；又如 1952 年对扎陵与鄂陵两湖的位置加以颠倒，在地理认识上也是一次大的反覆。

第二，从先秦迄至现代，由于人们对河源的认识，有的通过亲身考察，有的来自间接传闻，即使亲身考察，也因路线不同，地域不同，故在认识上产生差异甚至错误是可以理